

一八六二年日本「千歲丸」訪滬武士筆下的 中國士紳考論

易惠莉

華東師範大學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自江戶幕府實行鎖國體制，長崎是日本唯一允許外國人——中國人和荷蘭人——前往貿易之地，長崎也因此成為日本瞭解中國和世界的唯一窗口。日本文人學士為了學習漢學、蘭學而遊學長崎，赴長崎貿易的中國商人中則不乏文采學識俱佳者，在日本鎖國體制下直接的中日文化交流就以此為背景而展開。通過長崎，日本在吸納中國傳統文化方面以及在掌握現實中國社會政治知識方面均達到相當高的水準。¹

1862年「千歲丸」作為第一艘受幕府派遣由長崎出發來中國的日本商船，它的抵達上海既標誌著有二百多年歷史的江戶幕府鎖國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長崎貿易體制——的徹底終結，也標誌著中日文化交流的中心由長崎向上海的轉移，上海取代長崎成為幕末日本瞭解中國和世界知識的窗口。²這一歷史性的轉變自然包含交織雙方參與者身分和交流的內容的變化。作為率千歲丸訪滬的幕府及長崎官員從者的日本各藩年輕武士留下的訪滬實錄，如濱松藩名倉信敦（42歲）的〈官船千歲丸海外日錄〉、〈滬城筆話〉，高須藩日比野輝寬（24歲）的〈贅脫錄〉、〈沒鼻筆語〉，長洲藩高杉晉作（24歲）的〈遊清五錄〉，大村藩峰潔（38歲）的〈清國上海聞見錄〉，佐賀藩納富介次郎（18歲）的〈上海雜記〉，同藩中牟田倉之助（25歲）的〈航海日記〉、〈上海行日記〉、〈上海滯在中雜錄〉等等，為研究這一歷史性轉變提供了豐富的史料。長期以來，中日兩國的學者，尤其是日本學者，利用這批史料在以下方面進行了相當深入的研究。如當時日本國內的情勢，幕府派遣千歲丸訪滬的目的，隨

¹ 參見吉村永吉：〈來舶清人和迂齋〉，《長崎談叢》（長崎：藤木博英社）第三十輯（1942年）；易惠莉：〈長崎貿易中的中國商人和日本漢學者〉，《檔案與史學》2000年第6期。

² 參照沖田一：《日本和上海》（上海：大陸新報社，昭和十八年〔1943〕），「前編：幕末時代」。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惠莉 不得翻印

船的各藩武士各自的來華心態和動機，以及在上海的觀感對於日本二百多年鎖國體制下形成的中國觀的衝擊與由此帶來的中國觀的轉折等等。³不過，以上研究均未涉及武士實錄中所記載他們在上海所交流的中國士紳的討論，而這些中國士紳恰恰是武士們的上海觀感以及原有的中國觀受到衝擊而發生轉折的最直接，且最具體生動的對像。因而筆者以為在利用這些訪滬實錄重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和近代中日關係開端的歷史場景時，有必要就其中出現的中國士紳作出盡可能詳細的考訂。這是因為必須以交流雙方的具體人物為中心研究千歲丸訪滬事件，才更有助於清晰、全面地呈現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和近代中日關係的起始狀態，並由此準確地評估該事件的歷史影響。此外，這樣的研究還有三方面的意義。其一，關於千歲丸訪滬日本武士在上海接觸的社會階層，它直接聯繫著我們對實錄反映的中國社會現狀的真實性和深刻程度的評估，即實錄作為中國江南社會地方史史料價值的認識。其二，千歲丸訪滬作為開啟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和近代中日關係的標誌性事件，其承前啟後的歷史地位決定了它對長崎貿易體制下交流狀態的某種繼承，這對於正確認識中國在長達二百餘年的長崎文化交流中的獲益有重要意義。其三，中國東南沿海的社會人文遺跡，包括士紳的思想中保留有大量關於明代倭寇及十六、十七世紀之交中日兩國在朝鮮半島軍事對抗的歷史記憶，在二百餘年沒有日本人進入中國之後，當日本的年輕武士以橫跨長刀的形象出現在上海街頭之際中國士紳的反應，可以由此認識歷史記憶對於中國和日本這樣兩個既有深厚文化關係、又長期互相視為潛在挑戰勢力的國家的意義。

南匯士紳顧麟、顧翥

千歲丸於1862年6月2日抵滬，4日拜訪上海道臺衙門，5日使團離船下榻於「法蘭西人之高館（館名宏記）」，至於名倉信敦所謂使員「得許以隨意外出」，則已是11日了。⁴中國人進入宏記館拜訪日本武士似乎也起始於11日，如施熊、顧麟、顧翥都

³ 這些研究主要有：小島晉治：〈日本人的中國觀的變化——以幕末、維新时期為中心〉，載《日本史學年次別論文集》（東京：學術文獻刊行會，1992年）；佐藤三郎：〈文久二年幕府貿易船千歲丸的上海派遣〉，載《近代日中交涉史的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昭和五十九年〔1984〕）；衛藤濟吉：〈日本人的中國觀——從高杉晉作等人的立場談起〉，載《仁井田升博士追悼論文集》第三卷《日本法與亞細亞》（東京：勁草書房，1972年）；王曉秋：〈幕末日本人怎樣看中國——1862年「千歲丸」上海之行研究〉，《日本學》第一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馮天瑜：《「千歲丸」上海行——日本人1862年的中國觀察》（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

⁴ 〈官船千歲丸海外日錄〉（下文簡稱〈海外日錄〉），轉引自《「千歲丸」上海行》，頁418，419。

是該日首次出現在日本武士的訪華實錄中。施熊攜《戰國策》而來，令日比野輝寬有「大概是書坊的」「老窮書生」的印象；⁵至於顧麟、顧騫來訪則無任何功利意圖，實錄載顧麟稱「偶聽兄等在此地，趨教也」。⁶顧麟（字祥甫，號芷卿）「松江府學優生」、顧騫（字高羽，號秋岩）「南匯縣廩膳生」，他們的身分對初到上海，渴望結交中國文人的日比野、高杉晉作有相當大的吸引力。在互呈詩文交流之餘，日比野主動「問其住處」，並「約好次日再會」。⁷高杉與伊藤軍八12日即赴「南馬路萬隆醬園街」拜訪避難滬上的顧氏家族；⁸13日又有日比野、名倉、納富介次郎一行的拜訪。此後日比野、名倉仍多次拜訪顧氏，顧氏兄弟則也頻頻出入宏記館。由此顧氏兄弟成為與千歲丸日本武士交往次數最頻繁、交往人員最廣泛的中國士人之一。在探求顧氏兄弟與日本武士熱情交往的動因時，不能不提及顧麟的父親顧秉源。6月29日日比野第二次拜訪顧氏家時，對顧秉源留下了以下印象：「顧騫病情很重，顧麟和父親在吃飯。……顧麟的父親對我的來訪很高興，拿出茶點，並站在旁邊看我們筆語。」⁹顧秉源對其子弟與日本武士交往頗有興致，表明顧麟、顧騫兄弟6月11日入訪宏記館有其家庭背景。顧氏是南匯地方相當有地位、且歷史悠久的家族，光緒《南匯縣誌》顧秉源傳記云：

顧秉源，字潤齋，號竹虛，允貞族裔，居黑橋，監生。少有神童目，長益探討經史，不屑為舉子業。築臨池書屋，購藏精刻書近萬卷，人擬之小琅環。閉戶耽研，有《禹貢稽疑》、《石鼓考》等著，遭寇亂，與書屋並毀。尤喜聲律，工填詞，尚存《詞桃曲》、《塵水香渡吟稿》待梓，卒年七十一。¹⁰

從傳中可知顧氏家族富庶，家學淵源。1861年太平軍據南匯，顧秉源「家室被焚，家中所有書籍、圖畫、金石盡付一炬」。1862年5月清軍已克復南匯，然直至7月顧家仍不能不滯留滬上。在如此境況下顧秉源竟仍有心情支持子弟與日本武士交往，

⁵ 施熊，號渭南，日比野「問他是何人，說是做詩寫文章的」，「渭水人」，「老窮書生」；至於納富則稱施熊「在北京的學校是知名人士」，「從此天天來聊天」。見《上海雜記》、《贅臆錄》，載《文久二年上海日記》（東京：東洋文庫，昭和二十一年〔1946〕），頁12，70；《遊清五錄》，載《東行先生遺文》（東京：民友社，大正五年〔1916〕），頁78。

⁶ 《沒鼻筆語》，載《文久二年上海日記》，頁129。

⁷ 顧麟、顧騫係叔伯兄弟。見《贅臆錄》，頁70；《南匯縣續志》（民國十八年〔1929〕），卷一三，頁一〇。

⁸ 《遊清五錄》，頁78，109-10。

⁹ 《贅臆錄》，頁79。

¹⁰ 顧允貞，明萬曆壬午（1582）舉人，官至工部員外；允貞子章甫，「以貢授縣丞」，明清鼎革後清政府「舉山林隱逸，不赴」。見《南匯縣志》（光緒五年〔1879〕），卷一三，頁二六至二七；卷一五，頁三〇。

似乎可以從以下兩方面得到解釋。其一，南匯周浦鎮自雍正四年建漕運倉廩後，「漕艘畢集，市肆益盛」，道光年間漕糧海運又使其成為海運集散地。顧氏家族的富庶似乎與海運業有關，如顧麟之子顧應騶，「監生，以海運積勞，歷保至直隸州知州，加運同銜」。¹¹其二，道光六年(1826)日本漂流船在川沙遇救及遣返事件給顧秉源及南匯地方留下深刻印象，儘管該事件在千歲丸訪華錄中沒有反映。而有關1826年事件的〈漂流人歸帆送別之詩〉(抄本)，反映了川沙、南匯兩地士人社會對救援及遣返日本難民活動的關注，除地方官員外，如南匯縣庠生姜佑昌、顧心輿及流寓南匯縣城的徽州績溪縣人胡志堅等都參與其中。¹²千歲丸來滬想必喚起了顧秉源關於1826年故事的記憶，並影響到顧麟、顧嵩對日本的興趣。7月16日，顧麟擬暫歸南匯故里探視劫後家園，特赴宏記館向日本武士告別，並表達「弟明後年擬遊貴邦」之願望。7月27日日本武士啟程返國，顧麟再赴宏記館告別，又再表「來春必遊長崎，以期再會」之計劃。¹³

在與日本武士的交流中，顧氏兄弟在科舉制度等問題上向對方提供了較為完備的知識。¹⁴而在高杉與顧氏兄弟的筆談錄中，有如下一段值得提及的內容：

高杉：貴邦堯舜以來堂堂正氣之國，而至近世，區區西夷之所猖獗則何乎？

顧麟：從是國運凌替，晉之五胡，唐之回紇，宋之遼金夏，千古同慨。

高杉：國運凌替，君臣之不得其道故也。君臣得其道，何有國運凌替？貴邦近世之衰微，自為災而已矣，謂之天命乎。

顧麟：甚是甚是。¹⁵

高杉猛烈地抨擊了中國士人面對挑戰的消極天命觀，而顧麟對此則只有唯唯，難以應對。關於顧氏兄弟在1862年後的情況，據《張文虎日記》載：同治三年(1864)冬顧嵩應清政府平定太平軍後舉行的第一屆江南鄉試，未果；六年(1867)秋顧麟、

¹¹ 《南匯縣志》，卷一，頁一〇；《南匯縣續志》，卷一三，頁一〇。

¹² 參見王寶平：〈中日漂流民贈答詩勾沈〉，載徐靜波、胡令遠(主編)：《東亞文明的共振與環流》(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6年)，頁214-17。「顧心輿，號薌岩，錦江子，諸生，宿學能文，為一鄉之望。道光三年〔1823〕歲祲，勸賑不敷，出己資襄成善舉」。「胡志堅，號眉亭，新安人，能書善畫」，至1826年流寓南匯縣城已「二十八年」，「文士與遊者座恆滿，……終老邑城」。見《南匯縣志》，卷一八，頁九；《川沙廳志》(光緒五年)，卷一〇，頁二五。

¹³ 〈贅臆錄〉，頁104，116；〈沒鼻筆語〉，頁139。

¹⁴ 在有關中國賦稅、法律、國家對災害的治理、清軍與太平軍的戰況等問題上，顧氏兄弟只能泛泛作答。見〈沒鼻筆語〉，頁130-39；《清國上海見聞錄》(寫本)，長崎縣立圖書館藏「峰文庫」，據日本大分大學神戶輝夫教授提供複印件。

¹⁵ 〈遊清五錄〉，頁109-10。

顧騫同赴南京鄉試，顧麟中舉。顧騫直至光緒二年(1876)獲「歲貢」科名前，大約始終忙於應付科舉，而以在「南邑巨室」奚介眉家任塾師維持生計。¹⁶在獲取歲貢科名後，他仍「潛心撰述，教授鄉里」，「澹泊自安，布衣蔬食」。¹⁷作為江南名儒「張文虎入室弟子」，顧騫無疑在故里頗有地位，如同治年間張氏主持修纂《南匯縣志》，顧騫即充「採訪」。至於顧麟1867年中舉後，「大挑教諭，與婁縣章耒，同邑丁宜福、華孟玉相唱和，張文虎評其詩近芙蓉山館，詞近玉田、夢窗。晚更研求醫學，以術濟世」。¹⁸他對日本武士表示的訪日願望則始終未能實現，或許是訪日的激情在數年的科考中已消磨殆盡，抑或戰亂後的家境已無此等經濟能力。值得慶幸的是，顧氏兄弟與日本武士的交往在相隔十六年後又曾續上一筆，即千歲丸訪滬時的大阪武士伊藤軍八1879年辭去政府修史館掌記職後，於當年冬再度來上海。顧麟之侄顧淇作文記伊藤與顧麟的重逢：

先生原字子固，為東京柱下史，文辭詩古冠絕神州。咸豐季葉同日比野歡成(輝寬)西遊滬上，與家秋岩師、芷卿叔中外論交，筆談唱和，奚翅摩詰之于晁監。客冬又航弱水，重訪桃源，與叔他鄉遇故，歡倍於前。詢及歡成則已功取戎馬，勳名位業，彪炳瀛寰矣。臨別饋贈《皇朝史略》諸書，且言明春當復來。¹⁹

伊藤在明治時期仕途不得意，其所擅長並鍾愛的漢學又倍受壓抑，1879年的訪滬及其聲言「明春當復來」，反映了他對1862年訪滬故事溫馨的緬懷。

上海士紳王叔彝、王互甫

日本武士中的名倉信敦(號予何人)是訪滬一行中最具活動能力的一位，他此次訪滬實錄的《海外日錄》和《滬城筆話》所涉中國士紳人物之多和所述情節之豐富，是

¹⁶ 《張文虎日志》(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頁9，99，104，109，178；《南匯縣志》，卷一一，頁九、一六。

¹⁷ 《南匯縣續志》，卷一三，頁一〇。

¹⁸ 顧麟有《蝓溪吟稿》、《臨池小草》、《雙紅豆館詩存》、《靈素表微》、《內經疏證》；顧騫有《怡顏書屋稿》等著。見《南匯縣續志》，卷一二，頁五、九；卷一三，頁一〇。

¹⁹ 《遙贈伊藤和先生錄呈諸大辭宗正和並序》，《申報》，1880年11月5日。文中所謂「客冬」係1879年冬。三島毅《雪香伊藤君墓碣銘》稱伊藤和(?-1912)「字介夫，稱軍八，雪香其號」。「安政五年(1858)遊江戶，入昌平齋，為詩文挂。文久二年(1862)幕府遣吏視察清國商況，君隨行，掌筆談」，「數月而還，著《盾鼻隨聞錄》」。1875年「為修史館書記，尋轉協修及掌記」。1879年「辭職，再遊清國，翌年歸朝」。見《中洲文稿》(東京：二松學舍，大正丁巳〔1917〕)，第四集，卷二。

其他所有訪滬實錄不能及的。名倉交往中國士紳的能力甚至令其同伴吃驚，如6月13日日比野和名倉等入上海縣城，「名倉站在大馬路上與行人筆語，左右圍人數匝」，令日比野「不由絕倒」。²⁰ 這種非凡的活動能力，令名倉常以不速之客進入上海甚有聲望地位的士紳家庭。如名倉在6月19日記：「訪儒醫張玉書（玉書之家在北門內），此家有書生數十人。余入其塾內觀之，多童子，有習書法者，亦有讀書者。童子大抵學〈勸學歌〉、〈勸悌歌〉、〈神童詩〉等。蓋使初學之童子習此等書，似乃其風俗也。」²¹ 張麟祥，字玉書，上海數代名醫世家出身。滬上名士紳毛祥麟述張氏，「有聲於時，求治者踵相接，日得金數十，家頓裕。而供饌之盛，可擬貴官」。²² 名倉實錄記載最多的是他與王叔彝（名慶勛，字叔彝）、王互甫（名維鎮，字互甫）家族的交往，這種密切交往的關係也是在偶然的背景下建立起來的。〈滬城筆話〉以下7月5日的筆談錄表明了名倉第一次造訪王互甫宅的偶然性：

名 倉：聞城內有西人操練場，弟欲至其場，偶然過尊屋，邂逅遇名士，甚適弟願。

王叔彝：此地去小南門甚近，城內本有西人操練場，然為地甚窄，不足以容多人也。鄙居甚陋，今蒙兄過，實為榮幸。現在貿易何時可畢，約在幾時回棹，容再到宏記洋行請教。²³

名 倉：貿易告畢，解纜回棹，並在本月下浣。若鶴駕辱臨敝寓，弟等幸甚。

王叔彝：貴國有劉子賢，係中原青田籍貫劉伯溫先生之後，未知兄認得否？

名 倉：劉青田，是前明國初良臣也，其裔在敝邦者，弟始領教。但我武藏州有劉某者，自言漢獻之後，確否未知。²⁴

²⁰ 〈贅臆錄〉，頁72。

²¹ 〈海外日志〉，頁422。〈滬城筆話〉（寫本），藏於日本東京都立中央圖書館特別文庫「特別買上文庫」，編號3800。

²² 《上海縣志》（同治十一年〔1872〕），卷二二，頁二〇；毛祥麟：《墨餘錄》（上海：進步書局，缺出版日期），卷三，頁五。

²³ 該日「王叔彝」首次出現於名倉訪滬實錄，雙方無互致名姓的情節，而名倉以「名士」譽王氏甚確，王叔彝則瞭解千歲丸在滬活動甚細。這意味著名倉與王叔彝此前有過交往，大約是在上海道吳煦與千歲丸訪滬使節團數度官方會面的場合。6月4日千歲丸使節團拜訪上海道台衙門，其間使節團成員自由地與「道台之屬員筆談」，只是名倉〈滬城筆話〉未收該日筆談，而日比野則保留了該日與方春瑤卿（即與名倉筆談謙稱「弟身歷戎行，亦係粗魯之輩」的方瑤卿，時任上海新北門駐防官）的筆話。見〈海外日錄〉，頁418；〈贅臆錄〉，頁61；〈沒鼻筆語〉，頁129；〈滬城筆話〉，五月十九日（6月15日）。

²⁴ 劉基（1311-1375），字伯溫，浙江青田人，元末進士，後佐明太祖朱元璋建立帝業，係明初著名學者、政治家。傳見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3777-

王叔彝：聞劉子賢是文職，能詩能畫，是一位名士，中原人到曾見過筆墨，是以曉得。

名倉：弟亦知其人，其人今故。

名倉：高堂結構甚巍巍，敢問大兄係何官職？

王叔彝：此地係家兄住宅，家兄係是知府，弟係候補道，不住在此。

名倉：君家可謂門閥不賤，失敬，失敬。

王叔彝：弟住在城內，日來城門甚緊，是以急欲進城，緩日到洋涇浜請教，當囑舍侄奉陪。

名倉：大兄蓋係叔彝君令侄，請問大名。

王互甫：弟名互甫。請問兄職諸侯臣，司是文是武。²⁵

王叔彝(1814–1867)上海縣附貢生補用道，1857年署浙江嚴州知府，當年因父去世守制而去職。²⁶浙江桐鄉人沈寶禾1856年日記記拜會滬上政界紳界頭面人物，王氏家族「王叔彝(慶勛)、仁伯(慶榮)、泉生(慶模)」與郁泰峰、經芳洲等同在地方紳士之列。另該日記收滬上二十四家船商名錄，列名第三的「王公和」號在王慶榮、王慶棠(棟庵)兄弟名下，列名第十一的「王春記」號在王叔彝及其父王壽康名下。而王互甫係王慶榮之長子。²⁷從家族從業性質看王叔彝筆談中間及華裔日本人士劉子賢，這實是他常有交往赴長崎貿易華商經驗的反映。²⁸

名倉第一次入王宅所謂「高堂結構甚巍巍」並非客套，因為日後已是第三次來訪在被引入花廳後，名倉仍不禁對王氏宅院讚歎有加，見實錄：

名倉：尊居堂宇廣大，結構宏麗，誠以為耐驚，蓋大官高爵之居宜如斯。

王互甫：弟上祖以節孝起家，故敢造此屋，亦照例也。所送藍本帖即弟之高祖母節孝圖記。

〔上接頁168〕

82。王叔彝所問，當以明清鼎革之際劉氏後裔流落日本為理解背景。「漢獻」係漢獻帝，日本人認為東漢末年的動亂導致大量華人為避亂遷居日本，其中有帝王家後裔。如明治政府初期的外務大臣副島種臣就自稱「漢獻」後裔。這段筆談與1860年前後江南士紳期望遷居日本以避亂世的社會背景相關。

²⁵ 〈滬城筆話〉，六月初九(7月5日)。

²⁶ 同治六年(1867)復署嚴州知府，旋卒於任。見《嚴州府志》(光緒八年[1882])，卷一一(續增)，頁三。

²⁷ 〈忍默怨退之齋日記〉，載《清代日記彙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239，240，241；《上海王氏家譜》(寫本，上海圖書館藏)，卷一。

²⁸ 王互甫在交往中表現出對日本事情的興趣，見〈海外日錄〉，頁432；〈滬城筆話〉，六月初九、二十八日(7月5日、24日)。

名倉：君是係節孝之適裔，宜也。一言之下，節義足以感人也。庭上之卉木亦皆珍奇。²⁹

王氏家族是滬上海船商業界舉足輕重的大戶人家，家業創始於王慶榮之祖王文源（號春泉，1761-1832）、王叔彝之祖王文瑞（號輯庭，1764-1835）一代。王文源、文瑞兄弟幼年喪父，其母「苦節撫養」，「家徒壁立」，自少「學絞索藝」謀生，後與人合資「聚所絞索為肆，始釋手中藝而經營焉」；「繼隨商船往返渤海遼瀋間，貿遷有無，家始漸裕」。文源、文瑞兄弟於道光十二年（1832）在上海城東「建立宗祠三楹，嵌節孝事實圖於壁間」，以此奠定了王氏家族在上海的社會地位。³⁰王互甫向名倉贈其「高祖母節孝圖記」，該圖不僅是王氏家族彰顯於社會的資本，更被視為家族發達的道德本源。文源、文瑞一代奠定了王氏家業，第二代即有如文瑞之子王壽康（1795-1857）憑藉經濟力量積極參與刻書、慈善、資助文事活動等地方公益而聞達社會。據同治《上海縣誌》所載事跡：

壽康，字保之（號二如，晚號還讀老人），幼嗜學，入邑庠，留心經世，刊《古文經訓》、《資鏡》等集，重刊徐文定光啟《農政全書》；上〈三吳種植所宜並救荒各策〉于林文忠則徐，激賞之。擴宗祠，輯族譜，置義莊田贍族，每年冬施絮，夏施藥，歲饑施粥，築法華至城石路，群稱王善人。……招邑中能文者，月角藝於曙海樓，刻同人會藝。³¹

王叔彝作為家族第三代，在以文名世的同時，³²憑藉家業涉足地方政治經濟事務，並以此得官。見同治《上海縣誌》所載事跡：

咸豐二年，浙省試行海運，慶勛條例事宜，事竣以同知用。三年，上海陷，浙運將改由寧波，以沙船不習甯道，慶勛力排眾議，由劉河出口。劉河淺阻，請江浙協浚，商民便之。先後董辦海運凡八次。以賊久據上海，捐資募勇。……隨官軍克復邑城。赴浙以知府用，加道銜署杭州總捕同知。六年〔1856〕，浙垣寇警，復招舊部進屯玉山，調署嚴州府。³³

²⁹ 〈滬城筆話〉，六月十五日（7月11日）。

³⁰ 〈輯庭府君行述〉、〈二如府君行述〉，載《上海王氏家譜》，卷二。

³¹ 王氏家族王壽康一支1853年後定居南翔，1860年避難上海，戰亂平定後仍定居南翔。見《上海縣志》，卷二一，頁四一至四二；《嘉定縣續志》（民國十九年〔1930〕），卷一，頁二八。

³² 王壽康、王叔彝積極參與地方善事義舉，並贊助文事活動，深得社會及王韜、張文虎等文士的讚譽。王叔彝曾往宏記館送「自著詩集一部」於名倉。見《瀛壖雜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頁58；《覆瓿集續刻·懷舊雜記》（光緒十三年〔1887〕），卷三，頁一〇；〈海外日錄〉，頁432。

³³ 《上海縣志》，卷二一，頁四八至四九。

從說明王叔彝對地方政治經濟事務的影響力而言，下述嘉定人王汝潤記錄於當時的事例更具體切實：「南翔河淤塞數年，……潤說先生雖上洋籍，現居南翔，必須辦通此河為是。叔即應允，到上海寫捐壹萬千，嘉邑照田徵，每畝二十文，徵萬四千千。……九年十月動工，十二月告成。……莫大之利，叔彝成其事，嘉邑之幸也。」³⁴咸豐十年春太平軍陷蘇州後，上海道吳煦「委王叔彝雇炮船二十隻，土勇五、六百名前赴昆、青交界之葦葭浜扼堵」，以固上海防衛；而其弟王慶昌則在南翔主持團練。³⁵出自王文源一支的王慶模亦在地方事務上取得相當地位，咸豐七年，清政府辦船商捐務，慶模以「分發浙江候補知縣」的紳商身分「駐局專辦」；十年，任事上海捕盜局。³⁶王氏家族第四代在政治領域發展成功的代表人物，則是與名倉有一面之交的王維圻。王維圻(1837-1890)係王慶棠長子，字蓀甫，「由監生援例以花翎同知分浙，咸豐庚申〔1860〕粵寇圍杭，城中糧絕，維圻創用輪船運米千百石」，1862年「李鴻章方駐滬上，留辦轉運兵米」。7月19日名倉偶遇王維圻，聞其帶回有關南京的軍事資訊，並留有特殊的印象，所謂「余在上海，見過曾經戎行之人不少，然覺此人自帶殺氣，與承平之人不同」。³⁷

接近王氏家族這樣集官紳商於一體有四代經歷的世家大族，對於名倉瞭解中國江南社會的價值是不言而喻的，更何況名倉與王氏家族關係發展得遠超乎一般交往的程度。名倉是千歲丸武士中唯一能利用該次訪問建立私人關係，助成其在幕末和明治初日本對華外交活動中有不凡作為者。名倉能成功地與中國各層次文武官員實現交往，一則緣於其交際能力，更重要的則在於他對1862年間中國士紳的遭遇持同情理解的立場。³⁸名倉的訪滬實錄雖不乏日本至上的傾向，但他從不因中國士紳身處困境而言辭咄咄逼人。從名倉與王互甫的下述筆談中可獲此印象：

³⁴ 〈馥芬居日記〉，載《清代日記彙抄》，頁194。

³⁵ 王壽康有六子，長子慶勛、次子慶均、四子慶昌均入志。王慶均(字季平)以廩貢試用訓導，署太倉州學正，崇明縣教諭。王慶昌(字雨湘)同治年間修《上海縣志》，以「候選員外郎附貢生」出任監理。見《嘉定縣續志》，卷一一，頁二八；《吳煦檔案選編》第一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223，271。

³⁶ 《吳煦檔案選編》，第一輯，頁248；第六輯，頁242。

³⁷ 同治年王維圻在馬新貽、楊昌浚先後任浙江巡撫期間都受重用，歷充紹興、湖州等府厘局總辦。7月19日互甫向名倉介紹：「舍弟曾從張提軍(江南提督張國梁)、王撫軍(浙撫王有齡)辦理糧餉事。」以上見《上海縣續志》(民國七年〔1918〕)，卷一八，頁二〇至二一；〈滬城筆話〉，六月十九、二十八日(7月15日、24日)；〈海外日錄〉，頁431。

³⁸ 名倉對使節團中菲薄淮軍的議論不以為然，儘管他是出於傳統的軍事觀念稱讚淮軍。見〈海外日錄〉，頁428-30。幕末至明治初期，名倉是為中國士人記載最多的日本人(王韜1863年日記記作名敦，1879年《扶桑遊記》記作名倉敦；吳汝綸1870年日記記作名倉信敦，並收錄名倉詩作一篇)，這當與他的對華立場有關。

王互甫：請問西人到貴國可滋擾否？

名倉：敝邦自古稱武國，有日本刀，長者可以擊萬人矣，短可以刺千人矣。是以西虜不敢滋擾敝邦也。然敝邦承平既久矣，不敢不戒西虜也。弟亦敢告大兄，長毛是病在腠理，西虜乃心腹之患，一日懈怠，或病入膏肓，請戒之。

王互甫：是極，是極。³⁹

名倉善意的對華態度使王氏家族對他敞開了大門。名倉頻頻到訪不但受到王互甫的熱情接待，而且得到王互甫岳父侯小山（領「二品將軍」銜、時任「太湖協副將」）的禮遇。⁴⁰大約主要借助於侯小山之力，名倉成為唯一入訪淮軍大營、並有幸與張樹聲這樣等級的淮軍要員作過筆談的日本武士。⁴¹千歲丸離滬在即，王互甫「預使人奔走諸方」，邀「縉紳家內能琴棋書畫者」7月15日為名倉餞行；此後19日、24日名倉兩次赴王宅告別，王氏「其兄弟姻親之會文會武者遍會之」，侯小山、王叔彝、王慶榮均與之話別，王互甫則請名倉留「住居之所」，以便其「至貴邦時便於訪問」；名倉離王家之際「侯將軍送到門內，其他送到門外」。⁴²

名倉與王氏家族交往以後再續新篇。1867年名倉受幕府委派率員來華作商務考察，2月19日（正月十五日）抵滬，次日一行九人就住入王慶榮宅，直至5月2日（三月二十八日）歸國。期間旅滬的日本人士如岸田吟香、八戶宏光以及滬上洋行買辦、中國綢緞莊商人等紛紛赴王宅會見名倉；侯小山亦與名倉有書信往來。⁴³滬上文人對名倉亦不乏好感，如士人姚承燕有「緣君來訪春消息，劍佩誇傳太古風」詩

³⁹ 名倉詢問英法軍隊助守城門的軍費問題，以及他回答日中關係歷史問題，在陳述方式及措詞上均表現出有意回避衝突的立場。值得指出的是，名倉關於中西方關係的看法同當時南方士紳的政治立場有可溝通之處。見〈滬城筆話〉，五月十九日、六月初九、十二日（6月15日、7月5日、8日）。

⁴⁰ 〈滬城筆話〉，六月初九、初十日（7月5日、6日）。侯小山即侯攀鳳，江蘇靖江人，道光壬午（1822）科武舉人，道光二十三年（1843）任松江府右營副將銜參將，駐上海城。咸豐十一年（1861）江南太湖副將殉職，侯氏當年在滬接署，至同治三年（1864）。見《靖江縣志》（光緒五年〔1879〕），卷一一，頁四三；《松江府續志》（光緒九年〔1883〕），卷二〇，頁一、七；鄭言紹：〈太湖備考續編〉，卷一，載《太湖備考》（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616。

⁴¹ 6月13日名倉初識西門城防官員陳汝欽即表示「欲觀看操演」，然終無果。7月5日初識王互甫，又以「得觀李公營盤之操」求助，王互甫曾表此事之不易。日比野7月23日試圖進入軍營，「因無人介紹不能進去」。高杉、中牟田僅見過淮軍野外操練，未能進淮軍大營。見〈滬城筆話〉，五月十七日，六月初九、十一、十五日（6月13日，7月5日、7日、11日）；〈贅脫錄〉，頁85，111；〈遊清五錄〉，頁82。

⁴² 〈海外日錄〉，頁430，431，433；〈滬城筆話〉，六月二十八日（7月24日）。

⁴³ 同行者高橋怡之助在日記中詳細描述了王慶榮宅第。參見《日本和上海》，頁207-11。

句說名倉此次來訪。⁴⁴名倉此次訪華同樣有不凡之舉。他以「慕金陵名都，請於上海應(寶時)觀察」，得准搭輪船赴南京「限三日即返」。時任事江寧刻書局的戴望，於3月20日「道見日本國數人遊街市中，從而觀者甚眾」，當天即偕李善蘭赴名倉下榻的客棧拜訪，有「中亦有通書畫吟詠者」的好感。⁴⁵名儒俞樾在滬與名倉亦有一面之交。⁴⁶此外，名倉還於1863年作為幕府使節隨員赴法，途經香港曾拜會王韜。1870年7月明治政府首次派出與中國建交訂約使團來華，名倉亦在隨員之列，並以其在上海官方的關係為打開交涉途徑發揮重大作用。吳汝綸與陳蘭彬等人訪問日本使團後記：日本人田千之「言此次來通上國，乃倉敦主謀，倉敦五至中國，可謂奇士矣」。將1870年日本來華建交的起因歸於名倉當然過於誇張，不過此事卻表明明治初年日本人對名倉在中日關係中作用的肯定。1888年名倉又應劉銘傳在臺灣辦礦務之邀，率日本井工赴臺。⁴⁷

另外，王氏家族亦長期延續了與日本人士交往的傳統。如1884年日本漢學家岡千仞來滬，「王維圻及其弟維勤、維藩」曾往訪。⁴⁸清末新政時期王氏家族更新一代子弟中則有赴日求學者，如王守善，日本高等工業學校畢業，考授工科舉人，曾任駐神戶、橫濱總領事；王宰善，日本高等商業學校畢業，考授商科舉人，曾署新鄉縣知縣。⁴⁹

⁴⁴ 姚承燕，字芭孫(晚號詩民)，青浦諸生，同光間僑寓滬城三十餘年，平生以經史教授外，惟肆力於詩，有《淞濱草堂詩鈔》傳世，內收〈贈日本人倉敦〉。據〈謝公家福傳〉稱，慈善世家出身的吳縣人謝家福(1847-1896)1861年避難遷居上海後，「偶於客邸遇日本使者松窗相問答」。謝氏遇名倉年分待考，該傳記載此事的細節處多有虛妄。見《上海縣續志》，卷二一，頁一一；《碑傳集補》，卷五五，頁二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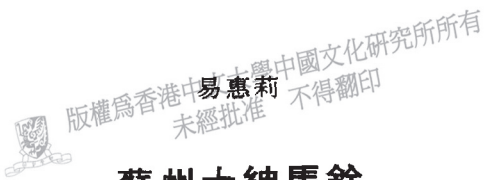
⁴⁵ 戴望(1837-1873)，字子高，浙江德清人，諸生，通音韻、訓詁，治經學。據同行日人安部記載，抵寧次日「名倉去了曾家」，應指拜訪曾國藩府邸。見《張文虎日記》，頁81；《日本和上海》，頁215-18。

⁴⁶ 俞樾對「好兵學」的名倉有「不足談」的評價。見〈與戴子高書〉，載《春在堂尺牘》，《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四十二輯(臺北：文海出版社，民國五十五年(1966))，卷一，頁二四。

⁴⁷ 王韜：《王韜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214；吳汝綸：《桐城吳先生日記》(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頁390，392；《大日本人名辭書》(東京：講談社，昭和四十九年〔1974〕)，頁1941。

⁴⁸ 王維藩，字價人，維圻弟，監生，董浙江海運滬局二十餘年。王維勤，字穀生，慶勛次子，同治五年(1866)歲試以第一名入縣學，宣統元年邑人公舉孝廉方正。見《觀光紀遊》(東京：石鼓亭，明治二十五年〔1892〕)，卷七，頁五；卷四，頁三；《上海縣續志》，卷一八，頁二一；《民國上海縣志》(民國二十四年〔1935〕)，卷一五，頁六至七。

⁴⁹ 王宰善，維泰子；王守善，維泰從子。王維泰，字柳生，王慶昌次子，光緒二十年(1894)稟貢生，曾執事於江南製造局。見《嘉定縣續志》，卷一〇，頁二、三至四；《民國上海縣志》，卷一五，頁一五。



蘇州士紳馬銓

日本武士進入的再一個江南士紳家庭——馬氏家族，其有區別於顧氏、王氏家族的特殊點。在上文所提數武士的上海實錄中，馬銓最早出現在高杉晉作筆下。高杉的上海實錄6月22日記：「清人馬銓來，話頗有文事，又能書，為予書『楠樹書屋』四字。馬銓本江州縣令，只今居喪，故辨〔辭〕官云。」⁵⁰馬銓，字銳卿，蘇州府長洲縣人，咸豐二年(1852)副榜貢生。⁵¹收在高杉上海實錄6月22日的筆談，於馬銓雖也有「聞兄讀書且談兵」的記錄，但在說明筆談背景的附注中則毫不掩飾地表達了對馬銓的不良印象，即「予聞此清人能談兵，故謙遜須〔順〕之，豈計以談兵為辭要賣書於我也」。馬銓的舉止令高杉有所輕視。而且該日高杉表露了「日本神國論」及「華夷變態」的中國觀，表明他與馬銓的筆談氣氛勢必不會融洽。⁵²

自6月24日名倉在關帝廟偶遇馬銓後，馬銓與日本武士的關係開始發生劇變。25日，包括千歲丸官員在內的數人在名倉陪同下赴西倉橋訪馬銓家，馬銓「大設茶果」，名倉「司筆談之事，與銓共談時事」。27日，名倉「代官吏訪馬銓」。⁵³29日，高杉又「陪從官吏到馬銓家」。⁵⁴同時在納富的〈上海雜記〉中也記載「知己書生馬銓來筆談」。⁵⁵可知馬銓與日本武士不同尋常的頻頻往還。

馬銓之所以受到名倉及千歲丸官員重視，有別於與日本武士交往的其他中國士紳，在於他的家庭背景。如7月3日名倉實錄記：「訪馬銓，其舉家出迎，遇余甚厚，晤語極歡。」馬銓向名倉展示了佩刀、槍、噴火筒等「兵器數品」。值得重視的是名倉與馬銓筆談中的如下內容：

名倉：聞君尊兄於丹陽與長匪戰陣亡，如尊兄可謂不背所學矣。請問當時官爵及贈諡如何。

馬銓：先兄馬釗，官蘭翎，內閣中書，陣亡後奉旨照四品官例賜恤，世襲雲騎尉四品官，尚無諡。⁵⁶

馬銓之兄馬釗以身殉國的事跡及「世襲雲騎尉」的家族背景，引起名倉和千歲丸官員對馬銓家族的特殊興趣。馬釗投筆從戎的事跡為江南歷史所罕見，馮桂芬作〈馬

⁵⁰ 〈遊清五錄〉，頁80。

⁵¹ 《吳縣志》(民國二十二年〔1933〕)，卷一七，頁一九。

⁵² 〈遊清五錄〉，頁80，114-15。

⁵³ 因千歲丸官員的漢文水平不足應付筆談，臨離上海之際，7月27日名倉代官吏到馬銓家致別。見〈海外日錄〉，頁423，433；〈滬城筆話〉，五月二十八日(6月24日)。

⁵⁴ 顯然高杉於此次拜訪缺乏興趣，所錄筆談極簡。見〈遊清五錄〉，頁81，114。

⁵⁵ 〈上海雜記〉，頁20。

⁵⁶ 〈海外日錄〉，頁425；〈滬城筆話〉，六月初七(7月3日)。

中書傳》開章即直抒如此感想：「吾吳古多文學士，而羽林期門倏飛之選，或代不一人，文武才尤罕。雖范文正胸有甲兵，而西事未盡愜於論者。越在有明惟韓襄毅號知兵，餘無聞焉。今所見以經生知兵者，中書馬君一人而已。」⁵⁷馬釗(1813-1860)「字燕郊，號遠林」，「道光二十四年〔1844〕舉人，嘗從陳先生碩甫遊，通六書音韻，於群書中用力《集韻》最久，手校數過成《集韻校勘記》若干卷」。⁵⁸《張文虎日記》有「借得影宋鈔本《集韻》，及亡友馬遠林閱讀所為校勘記」，⁵⁹可見馬釗學術造詣之深。面對太平軍佔領南京後引發蘇南動亂威脅的嚴峻挑戰，馬釗1853年建議籌募「撫勇」，保衛蘇南地方安全。馬釗主「撫勇」籌餉轉運事，並在平定小刀會起義的軍事活動中初建功業，「敘功得內閣中書」。1858年夏南京軍情緊急，馬釗應召入江南大營，1860年春浙江告急，借總兵熊天喜赴援，「復四安鎮、廣德州，奉調馳回，遇賊丹陽，戰白塔灣，中彈死」。⁶⁰馬釗的一生完善地體現了儒家對於士人理想品格的要求：既有完善的學術修養，又能在臨危時表現出「士志於道」的獻身精神。

1862年千歲丸武士普遍認為中國「近世之風，有志者少，貪科第者多」，「而世終溺於虛文卑弱，遂國不能治，內遭長匪之苦，外受夷狄之制」，「可憫可歎」。⁶¹在這樣的背景下，馬釗形象的出現自然令他們耳目一新。至於馬銓雖因其兄在日本武士中贏得「能談兵」的名聲，但他本人則從未被武士看重。⁶²日比野對馬銓有如下評價：「此人略有文才，可與共語。不過其人輕躁浮薄，頗多虛飾，自云：我是官員，曾與長毛賊數戰，長毛無大志，僅好事喜掠奪。意氣揚揚，卻乏憂國之色，由此可見其人如何。」⁶³

⁵⁷ 《續碑傳集》(宣統二年江楚編譯書局刊校)，卷五四，頁二三。咸豐初年馬釗與馮桂芬、吳雲等士紳關係密切，參見《何桂清等書劄》(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208，215，222。

⁵⁸ 陳奐(1786-1863)字碩甫，長洲人，為清代著名經學家。見張星鑒：〈懷舊記〉，載《續碑傳集》，卷七九，頁七。

⁵⁹ 《張文虎日記》，頁21。

⁶⁰ 《續碑傳集》，卷五四，頁二四。

⁶¹ 〈上海雜記〉，頁11。

⁶² 據蘇州士人蔣寅生1863年1月日記，可瞭解馬銓當時謀求辦捐職務的情況。日記中馬芝生者係馬銓族兄，時在署江蘇按察使劉鄜膏幕任委員。見〈寅生日錄〉，載《太平天國史料專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頁431，432，433，445；《上海小刀會起義史料彙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頁174；〈馮申之先生日記〉，載《清代日記彙抄》，頁289；《郭嵩燾日記》(二)(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62。

⁶³ 該日日比野與兩位來訪書生筆談，馬銓以「彼等鬼奴(意指為教徒)，不足論學」說書生，並阻擾筆談，令日比野不滿，稱「真正的鬼奴是馬銓」。見〈贅臆錄〉，頁96。

1862年在太平軍戰亂背景下的上海，難以給日本武士留下樂觀的對華感想，除社會秩序徹底喪失外，中國士紳個人的精神狀態和境界也令來訪者難以同情和理解。面對名倉滿懷期待的臨別贈言：「諸君為國自愛，不使寸土尺壤為西虜所掠，是亦弟所深望于諸君也。」王叔彝的答辭僅是：「自慚力小，未敢空言。」⁶⁴雖然士人投筆從戎的風尚在1860年前後已由湖湘、江淮擴展到江浙，當時上海聚集了相當數量的此類人物，成為日本武士主要的交往對象，在某種意義上他們是造就日後「同治中興」的社會中堅，然如馬釗那樣勇毅有為者甚少。就整體而言，南方士紳以自衛而起抗擊太平軍的自救運動，在根本上缺乏高遠的精神境界的依託。就個人而言，投筆從戎者多未擺脫單純追求仕途發展的束縛，這樣的實況無疑為日本武士所知。正如此，馬釗之事跡才格外引發日本武士的興趣。

無錫士紳華翼綸

主動拜訪日本武士的中國士紳中不乏身分高於顧麟、馬銓者，⁶⁵如千歲丸到滬一個月餘的7月上、中旬之交，就有一批身分頗高的士紳頻繁在宏記館露面。

日比野7月6日記錄了兩位來訪者的名片：「常州府學廩生周士錦端」、「常州府金匱縣國學生尤克勤」。因日比野在病中，無法交流，只得「約期再會」。⁶⁶7月8日、9日，尤克勤連續兩日來訪，尤氏評定日比野「詩句之長短」，令日比野有「裨益不小」之感。⁶⁷而7月11日周士錦再度來訪時，同來者的身分和排場令日比野頗感興奮。見日記：

早餐尚未結束，即有來訪者的名片遞到：「大清朝敕授文林郎江西永新縣甲辰科舉人華翼綸端肅拜」。迎至門外，見來者身後尾隨七人。華是麾下有七萬士兵的大將，頗有勇相。聽說華與長毛有四十餘戰的經驗。華有文才，與

⁶⁴ 〈滬城筆話〉，六月二十八日（7月24日）。清代政治上鼓吹以孝治天下，並以表彰節孝為社會道德號召，直至十九世紀中後期此風在江南士紳家族仍不見衰。在1862年，江南士紳仍以節孝向日本武士彰顯家族的榮耀，如顧騫出示附名家序贊的「割股療母」圖，王互甫展其高祖母節孝圖記，但並不被日本武士所看重。見〈贅臆錄〉，頁71。

⁶⁵ 華亭縣紳士華毓慶咸豐十年辦團練禦太平軍，曾在宏記館與名倉作筆談。見〈滬城筆話〉，五月二十四日（6月20日）；《吳煦檔案選編》，第一輯，頁58。

⁶⁶ 〈贅臆錄〉，頁71，97。

⁶⁷ 同上注，頁103。又，有記載云：「尤克勤，字拙齋，金匱人，依其妹夫張姓僑寓吾邑者幾十年。學有本原，尤長於詩，與浦文俊輩唱和，精鑒古碑帖。」見《嘉定縣續志》，卷附（前志補遺），頁九。

之筆談頗愉快。華云：……聽說我國人來滬上，即慕名而來。華極謙遜，不談軍事，惟云：諸事皆不成，僅幼時即好畫，常常隨意塗抹。⁶⁸

雖然日比野高估了華翼綸的身分地位，⁶⁹但他也的確非等閒之輩。1860年春王韜在滬與其初識就有「笛秋明府人品溫粹，嗜奇好學，今君子也」這樣極佳的印象。⁷⁰後王韜更在《瀛壖雜誌》中對他的才藝大加讚賞，稱其「山水師麓台，收藏極多。其作畫也，運筆如飛，竟日可作大幅四五本，元氣淋漓，興會標舉，其得意處，直足上窺北苑。性嗜酒，交遊處世，一以率真」。⁷¹王韜之言雖有誇張，但結合日比野筆下的形象，說明華翼綸是具有藝術氣質的文人。

華翼綸，字笛秋，號邃秋，出身於無錫有地位有財勢的世家大族。其曾祖實庵公(1741-1798)亦商亦儒，一面是「工制藝，試不售終不悔，以嘉慶戊午年〔1798〕應江南鄉試，病卒於金陵寓中」。另一面則是「舉業之暇，輒逐什一之利，多奇中，以是家日充」，「及其卒時，積資累巨萬」。祖父華文瑛(1769-1839)曾「以縣學生隨實庵公同應戊午江南鄉試」，後「入資為吏部司務」，「官吏部二十二年始選官福建」，官至署福甯府知府。父華沛恩(1789-1858)以長子主家事，「恆自習醫」，曾「以太學生應南北鄉試，戊寅〔1818〕薦，不售」。其父科場失意，致華翼綸的教育受到格外的重視，年十二即「延師教讀」館於家，並終成為華氏家族的第一位舉人。⁷²華翼綸「道光庚子〔1840〕始遊京師」，「舉甲辰〔1844〕恩科順天鄉試，三上會試不第，遂從征粵西」。⁷³華翼綸因此成為親身經歷過太平軍初興階段鎮壓活動的少數江南士紳之一。

時無錫人鄒鳴鶴接廣西巡撫任，在京候官的華翼綸以幕員隨行，於咸豐元年(1851)六月抵達桂林。次年春太平軍「自永安突出」圍桂林，鄒鳴鶴借重提督向榮之兵力守城月餘不破。5月中，太平軍撤圍北去。6月，因鄒鳴鶴遭參革職，華翼綸

⁶⁸ 〈贅狀錄〉，頁101-2。

⁶⁹ 關於日比野稱「華極謙遜」，必須以更全面的理解。華翼綸筆談中對太平軍戰事時常誇大其詞，由此造成誤解：日比野記錄常勝軍攻青浦新聞，在所謂「華的副將」下加注「即筆語中華翼綸的副將」，顯然是對美國人華爾張冠李戴。見〈贅狀錄〉，頁68，161-63。

⁷⁰ 《王韜日記》，頁134，135。

⁷¹ 華翼綸與徐壽訂交及其子華蘅芳從西方傳教士遊，包括他7月11、15、27日三訪宏記館，均顯示其善於交友。見《瀛壖雜誌》，頁79；華翼綸：〈徐壽傳〉，載《碑傳集補》，卷四三，頁一三。

⁷² 《荔雨軒文集》(光緒九年梁溪藏版)，卷六，頁三至四、五、六；卷四，頁三；卷六，頁七至八。

⁷³ 所謂「庚子余應順天鄉試」。見《荔雨軒文集》，卷四，頁六；卷五，頁二五；卷六，頁七。

也於當年回鄉。⁷⁴因「從軍粵西居戎帳者一年」，獲有「六品軍功」，又逢太平軍佔領南京，威脅蘇南的政局，華翼綸在鄉頗有作為，在籌建「盤查局」、辦理釐金等地方事務中均係要員。⁷⁵1854年下半年華翼綸再赴北京，半年後「選官江西永新縣」，⁷⁶他到任的1855年正值太平軍石達開部橫掃江西，華氏「以永新失守革職」。⁷⁷歸鄉後的華翼綸沈湎於書畫交遊的鄉紳生活，直至1860年2月華氏父子及徐壽等遊滬上，尚向王韜表示「八月中重遊此間」。⁷⁸此次出遊歸里後的經歷，見薛福成作〈華翼綸傳〉所言：

俄而金陵大軍潰退，君集族人倡行團練，長洲徐氏、張氏皆翕然應之，聲勢頗盛。當是時，蘇、常諸郡皆不守，而蕩口以一鄉孤峙賊中，與勁寇相持者二年，事聞於朝，優旨嘉獎。君察知賊勢強，非藉楚軍之力不能滅賊。……君乃間道赴上海，偕太倉錢敏肅公鼎銘等乘輪船上駛，謁文正公乞師。⁷⁹

1860年夏，上海政界對蕩口鎮華氏團練寄予厚望，有所謂「圖無錫則以華氏為勁旅，而各團亦能接應」。⁸⁰儘管華翼綸亦自稱「轉戰數十次，而鄉鎮得存」；「團勇嚴陣以待，賊不敢犯秋毫」。⁸¹然此間團練情況並不樂觀，即便華氏參與修訂的無錫縣志亦稱團練「軍無紀律，餉亦不繼，擠拄數月，卒相率解散」。⁸²因此薛福成所謂「蕩口以一鄉孤峙賊中，與勁寇相持者二年」是另有背景。見1860年夏秋之間王韜上書上海道吳煦言蘇南團練與太平軍之關係：「口〔永〕倉〔昌〕蕩口雖與賊通款，而其心無一刻不思承間殺賊；賊之授以偽爵，亦以口口心內懼而外結之，顧徐氏、

⁷⁴ 薛福成：〈鄒鳴鶴行狀〉，載《續碑傳集》，卷五五，頁一〇至一二。

⁷⁵ 《荔雨軒文集》，卷五，頁二五；〈勾吳癸甲錄〉，載《太平天國史料專輯》，頁77，78，81，82。

⁷⁶ 鄒鳴鶴革職回鄉，即受兩江總督邀赴南京協守，後城破殉難。1854年，春江蘇巡撫等為其請恤得准。在此背景下，華翼綸攜所作廣西陣亡者傳文入京。見《荔雨軒文集》，卷五，頁二五；卷六，頁一；《荔雨軒詩集》，卷中，頁五；〈勾吳癸甲錄〉，頁76，81。

⁷⁷ 華翼綸1855年失官，後於1864年清軍「克復蘇常案內復官」。見《荔雨軒文集》，卷六，頁八；《永新縣志》（同治十三年〔1874〕），卷九，頁三四。

⁷⁸ 1857年其子華蘅芳來滬從傳教士學習達三月，華氏父子與徐壽交遊亦當在此期。見《王韜日記》，頁135；《荔雨軒文集》，卷六，頁一六。

⁷⁹ 《廣清碑傳集》（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850-51。

⁸⁰ 《吳煦檔案選編》，第一輯，頁288，289。

⁸¹ 《荔雨軒文集》，卷四，頁一五。

⁸² 當時江浙地方團練實際上依賴於本已存在的非法武裝勢力——槍船集團。無錫地方久有「巢湖船者，向販私鹽為業，約數百人」，1854年辦「盤查局」華翼綸即依賴其打擊異己力量。1860年蕩口鎮辦團練勢必倚重「巢湖船者」，華翼綸對其駕馭力也勢必有限。見《無錫金匱縣志》（光緒七年〔1881〕），卷七，頁一六至一九；〈勾吳癸甲錄〉，頁82。

華氏之不敢先者，以後繼無人，未能妄動口口口懲各處焚殺之慘，氣沮喪懾而不可用也。」⁸³至1860年初冬，蘇南團練與太平軍的合作關係更趨公開，太平軍蘇州守將熊萬荃招撫徐佩瓊後，熊、徐到蕩口鎮與華翼綸約和。⁸⁴華翼綸所謂「以團練保鄉里」——以保家族地方利益為首要考慮，而與太平軍勢力取局部合作立場是當時留居故里士紳不能不有的權宜之計。馮桂芬之子馮芳緝1861年2月24日記錄了徐佩瓊、華翼綸與太平軍熊萬荃交接事情及關於此事的感想，所謂：「聞賊首熊某久謀反正，為他賊所覺，幾至被害，乃出城剃頭，與徐少衢〔蘧〕、華滌〔笛〕秋合力殺賊，華、徐二公初亦詐投於賊，今並反正禦敵，亦一可喜事也。」⁸⁵馮芳緝如此理解熊萬荃在長洲永昌、無錫蕩口的活動，不清楚是否徐、華有意隱瞞虛報所致。然就此可見留居故里的士紳周旋於太平軍管轄和清政府遙控之間的困境。1861年中華翼綸「問道赴上海」，其緣由亦在擺脫這一困境，儘管他在〈避地至上海〉等詩中強調無力抗禦太平軍而避難滬上。⁸⁶來滬後華氏在「借師助剿」和請兵曾國藩的活動中十分活躍，除作為錢鼎銘乞師一行中的要員於1861年11月抵安慶曾軍大營外，還於1862年1月、3月為護送其子華蘅芳及徐壽等江南西學人才和接運淮軍赴滬又兩次赴安慶。⁸⁷淮軍到滬後，李鴻章「檄君〔翼綸〕辦船捐協餉、大營嚮導、文報、善後各事」。10月，郭嵩燾來滬為淮軍辦糧，他與潘曾瑋同列接待人員中。⁸⁸總之，千歲丸訪華之際，華翼綸是滬上政界的重要人物。以此為背景探究其主動拜訪宏記

⁸³ 《吳煦檔案選編》，第一輯，頁412。

⁸⁴ 《荔雨軒文集》，卷四，頁一六；董蔡時：《太平天國在蘇州》（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268。

⁸⁵ 「出城剃頭」指熊萬荃公開向清政府投誠，事實上1861年初並無此跡象。1861年10月上海關於熊萬荃率軍出蘇州城「竄擾洙涇一帶」情報，稱其「意在窺伺東南，為飽掠之計，望轉致各營，預為準備，亦應亟為防禦」；同時亦有「熊姓到蘇，沿路皆香燭迎接，以其不擾害百姓也」，說明其與地方士紳合作良好。直至1861年末徐佩瓊迫於清政府的壓力，策劃熊萬荃、錢桂仁、李文炳反正，事敗露後徐氏受到太平軍嚴控，並終在1863年春清軍進攻蘇州之際遭殺。見〈馮申之先生日記〉，頁284；《吳煦檔案選編》，第二輯，頁122，123。

⁸⁶ 地方團練與太平軍約和，團練頭面人物勢必將接受太平軍授職，如徐佩瓊等即被視為「食賊之祿，受賊之職」者。這勢必將影響當事者在戰亂平定後的社會政治地位，並遭政府勒捐。華翼綸來滬有保持蕩口團練與清政府聯繫的意義，此後蕩口團練仍維持與太平軍的合作關係，華翼綸家業安然無損（其宅第未毀於戰亂，只有部分在1863年清軍入駐蕩口之際毀於駐軍炊火）。戰亂平定後，蕩口團練重要人物「業實精貨殖之術」的華存吉亦「得保知州銜，賞戴蘭翎」。見《荔雨軒詩集》卷中，頁一七、一八、二三；《荔雨軒文集》，卷四，頁一五；〈虎窟紀略〉，載《太平天國史料專輯》，頁48。

⁸⁷ 《荔雨軒詩集》，卷中，頁二〇。

⁸⁸ 1863年春淮軍、常勝軍進兵嘉定、昆山，華翼綸與龔橙「解餉至營」。見《廣清碑傳集》，頁850-51；《郭嵩燾日記》（二），頁75；《荔雨軒詩集》，卷中，頁二一。

館的緣由，不能不提及1855年華氏赴江西永新知縣任之際所作〈將赴官江西便道攜妹歸省〉詩之二：「蕭然行李上征鞍，百不如人此見端。才短始知生計絀，時艱轉覺宦途寬。敢貪薄祿輕千里，堪慰高堂祇一官。屈指歸期春欲暮，還家應共月共樂。」⁸⁹此詩道出了華翼綸對亂世間得官禍福難卜的不安。儘管1862年華氏的政治生命重趨活躍，但廣西桂林、江西永新兩度宦途沈浮的經驗令他於亂世下的仕途機遇深感不安。當時華翼綸以恢復故里為立場參與平定內亂的政治活動，然已無心仕途。蘇南平定後，面對「敘功開復原官，旋保以同知分發補用，加知府銜」的官運，華翼綸卻僅滿足於鄉居生涯。對此薛福成亦有所感慨：「君罷官時年未五十，其才與力尚足以有為，而決然不復再出者，何哉？豈其多閱事變，志意已稍倦歟？」⁹⁰

在此時消極的人生態度外，故里無錫地方的人文因素亦促使「嗜奇好學」的華翼綸拜訪宏記館。服務於江南製造總局譯書館的西方人傅蘭雅(John Fryer, 1839–1928)曾將華蘅芳和徐壽、徐建寅父子西學成才歸因於無錫地方人文，所謂：「無錫為江蘇常州府之一縣也，南濱太湖，城池雄壯。所有人民，大都巧於工藝，且認真作事，志在必成，又有往來日本國者。而士人多以為詩書經史幾若難果其腹，必將究察物理，推考格致，始覺愜心；如是者凡數人，而徐、華二君好之尤甚。」⁹¹傅蘭雅長期與華蘅芳及徐壽父子共事，他關於無錫地方人文風氣之感想，以及「又有往來日本國者」的說法自然得自華、徐二氏口傳。華翼綸、周士錦、尤克勤諸位慕名頻頻往訪宏記館，其中應有受往日交遊赴長崎貿易華商的經驗促動的因素。如周士錦在向日比野表達長期保持聯絡及有朝一日訪問日本的願望時，就明確表明他具備與赴長崎華商聯繫的途徑，所謂：「日後尚當音問相通，今秋尚有人到貴邦貿易，如蒙惠書可即交與，帶至上海可達。」⁹²

浙江士紳嚴伯雅和山西士紳溫忠彥

名倉的實錄中還有一位值得提及的江南人士，即他於7月6日訪新北門駐防地所遇到的「各城總巡」嚴伯雅，⁹³因有感其「衣冠甚盛，蓋大員」，而主動與他筆談。嚴氏不

⁸⁹ 《荔雨軒詩集》，卷中，頁五。

⁹⁰ 《廣清碑傳集》，頁851。

⁹¹ 傅蘭雅：〈江南製造局翻譯西書事略〉，載《中國近代出版史料》初編(上海：群聯出版社，1953年)，頁10。

⁹² 周士錦，無錫人，同治元年(1862)貢生。光緒年修無錫縣志，周士錦與華翼綸同任「採訪」，周氏名下署「國子監學正銜，沅陽縣訓導」。見《贅臈錄》，頁142–46；《無錫金匱縣志》，卷一七，頁二二。

⁹³ 咸豐十年(1860)嚴伯雅以海防同知負責「大、小東門」的防衛。見《上海縣志》，補遺，頁一一。

但熱情回答名倉的問題，而且數日後又以「其所著詩集」相贈。⁹⁴ 嚴伯雅的熱情及其歷練，令名倉對他大有好感，稱其「文武兼全，傑士也」。⁹⁵

嚴伯雅(1819-?)，名鈺(後改名錫康)，浙江桐鄉烏鎮人。嚴氏家族自伯雅「高高祖君美公」，「以服賈創業起家」，至其曾祖嚴大烈輩，「積累三世，遂成巨富，共開典肆十處；鄉人至有嚴百萬之稱，實有家資數十萬」。伯雅祖父嚴寶傳(1781-1814)「席(襲)祖業，甚豐」，「天性慷爽，所交多知名士」，「時有文酒之會」。寶傳早逝，其妻蔡氏「家本德清望族」，「父兄行有兩進士」，因此「延名師」教子，並以「讀書最好」為遺訓。⁹⁶ 伯雅之父嚴廷鈺(?-1852)「十七歲入邑庠，旋食廩餼」，「五試秋闈，屢薦不售，乃援例以同知需次雲南」，官至順甯府知府，曾「兩督銅運入都」。⁹⁷ 嚴廷鈺「宦滇二十餘年」，子侄輩入滇謀事者甚眾。廷鈺有三子，長子嚴伯雅，隨父「從宦滇南，以縣丞在滇試用」，並「逾格以軍功薦擢縣令」，「由保寧調任荔波」，「旋以貢金入都」，從而以「監生，江蘇候補知府」於咸豐十年(1860)署松江海防同知。⁹⁸ 三子嚴謹「幼隨父宦滇，以太學生應南北闈試，屢薦不售，父歿後入資得縣丞，投效貴州軍營」。⁹⁹ 唯有次子嚴辰(1822-1893)是以掇高科步入仕途，令嚴氏家族門楣增光。嚴辰(原名鏞，字子鍾，號緇生、芝僧)「道光癸卯〔1843〕省親雲南」，「借貴築籍入闈」，「中式後改歸原籍，咸豐己未〔1859〕成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¹⁰⁰ 一門三兄弟均入官，令嚴氏家族在南方官場頗有影響力。1862年10月，郭嵩燾以「蘇松糧道」到滬為淮軍辦餉，在滬的士紳紛紛在其門下鑽營謀職，嚴伯雅亦在其列。雖然因其捐納出身遭遇有勢力的士大夫潘曾瑋詆毀，但最終嚴伯雅還是在當年謀得「赴九江辦理茶捐」的優差。¹⁰¹

⁹⁴ 嚴伯雅《餐花室詩稿》係作者1860年「於滬濱官舍自定其詩為十卷，附以詞一卷，將付剞劂」。名倉獲贈的即該詩集。見《烏青鎮志》(民國二十五年〔1936〕)，卷三八，頁七〇至七一。

⁹⁵ 《滬城筆話》，六月十、十九日(7月6、15日)；〈海外日錄〉，頁426。

⁹⁶ 《桐溪達叟自編年譜》(光緒年間刻本)，頁二、三、五；《烏青鎮志》，卷一七，頁一六；卷二四，頁九；卷二九，頁一四、一七；卷三一，頁七。

⁹⁷ 嚴廷鈺妻王氏出身婺源望族，其父王鳳生早年官「烏鎮同知」，道光初年先後官「河北道」、「兩淮鹽運使」，廷鈺及其子女均「嫻於吟詠」。見《烏青鎮志》，卷二九，頁一七；卷三一，頁八；《桐溪達叟自編年譜》，頁五、六。

⁹⁸ 陸以湑：《冷廬雜識》(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頁406；《松江府續志》(光緒九年〔1883〕)，卷二〇，頁三二；《烏青鎮志》，卷二七，頁三一。

⁹⁹ 咸豐六年(1856)嚴謹得「奏保知縣」，後以監生官貴州石阡知府，同治五年(1866)死於地方叛亂。見《烏青鎮志》，卷二七，頁三一。

¹⁰⁰ 1867年後長期任桐鄉立志書院山長，主持修志等地方事務。見《烏青鎮志》，卷二九，頁二五至二六。

¹⁰¹ 同治元年劉郇膏出任松江府海防同知(見《郭嵩燾日記》(二)，頁75，79)，嚴伯雅與名倉筆談中自稱「曾官松江海防同知」，表明其時他已離該職。

1866年嚴伯雅再度出任松江海防同知，1867年名倉再度來滬時曾專程拜訪他。¹⁰²此後雖不見嚴伯雅與日本人士交往的記錄，但他開啟了嚴氏家族在光緒年間與日本漢學界的交往，其中以其弟嚴辰為最著。嚴辰以學者及詩人的身分與明治時期的漢學家結為文字交，1884年日本著名漢學家岡千仞來滬就曾登門拜訪嚴辰，並有在蘇州訪嚴伯雅之妹夫沈秉成未遇的經歷。¹⁰³

日本武士在滬接觸到的中國士紳中，比前述諸人有更純粹士大夫家庭背景的似乎是與高杉晉作有一面之交的溫忠彥。6月16日高杉赴西門防所，偶遇自稱「官蘇州司馬」的溫忠彥。溫忠彥，字笛樓，出自山西太谷世家大族，道光十七年(1837)舉人，「京兆試官內閣中書，外選蘇州海防同知」，即咸豐九年(1859)事，任內又「以海運京糧敘功擢知府」。忠彥祖父官至福建巡撫，父親以舉人官刑部郎中，其弟溫忠翰「咸豐八年(1858)舉順天鄉試，同治元年(1862)春捷以第三人授職編修」。¹⁰⁴

雖然家世顯赫，自身仕途發展亦頗順暢，但是1860年蘇南全面失守後，失位官員大量聚集滬上，溫忠彥同樣面臨謀事壓力，他也是1862年在郭嵩燾門下謀職者之一，¹⁰⁵由於他的家族背景，其願望得以滿足。次年蘇州收復，溫忠彥「總辦得勝厘卡」，其後1865-1867年署太湖理民(水利)同知。¹⁰⁶

據《太谷縣志》稱：溫忠彥為官清廉，「去官之日遮道而送者數千人，蕭然囊橐，不名一錢，視之泊如也」。當然這樣的記述未必完全當真，不過，關於溫氏性情則有所謂「暇時喜為詩歌以言志，寡交遊，天性淡泊，無疾言遽色」，而高杉的筆談記錄也基本與上述溫氏的性情相符。與高杉的筆談間溫忠彥表現甚謙和，初見即有「久仰貴邦文明，幸獲一晤」的友好表示。從溫忠彥的性情而言，他並無傲視日本武士的心理，只是深受中國傳統的朝貢體制觀念影響，當他欲以得自朝鮮貢使關於日本國感想進一步表達友好之意時，有所謂「貴國文治為東諸侯領袖，欽佩已久」之語，不自覺地將日本歸於「東諸侯領袖」的藩屬地位。高杉雖當即未對

¹⁰² 《日本和上海》，頁220。另有同治六年(1867)「秋間伯兄(即嚴伯雅)以辦理海運忤丁中丞日昌，意乞病去任」之說。此後嚴伯雅長期寓居滬上，光緒五年郭嵩燾出使歸國途經滬上，曾「從嚴伯雅處拜訪」故舊；光緒六年辦理晉賑表彰名錄中，上海保嬰局目下有「嚴紳錫康」。見《桐溪達叟自編年譜》，頁六五；《郭嵩燾日記》(三)，頁824；《鄭觀應集》(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1105。

¹⁰³ 沈秉成，字仲複，浙江歸安人，咸豐進士，同治年後期官上海道，1875年在四川按察使任上病免，在蘇州有私宅「耦園」。見《觀光紀遊》，卷一，頁八；卷二，頁三。

¹⁰⁴ 《蘇州府志》(光緒九年[1883])，卷五五，頁八；《太谷縣志》(民國二十年[1931])，卷二，(選舉)頁二九、(仕籍)頁一五；卷五，頁九至一一、三五、三七至三八。

¹⁰⁵ 《郭嵩燾日記》(二)，頁67。

¹⁰⁶ 縣誌有所謂「屢司厘務，籌餉百餘萬金」說。見《寅生日錄》，頁445；《太湖備考續編》，卷一，《太湖備考》，頁614；《太谷縣志》，卷五，頁三五。

此作反應，但在隨後的筆談中高杉有「口雖唱聖人之言，身已為夷狄所奴僕矣」等激烈言辭，¹⁰⁷ 應當是針對「東諸侯領袖」而來。

西門防所的官員侯儀、陳汝欽

千歲丸日本武士們的訪華實錄中出現的清政府在職下層官員頗多，而西門防所的侯儀、陳汝欽屬於其中最引人注目者。侯儀「號梧軒，係浙江臺州府臨海縣人」，咸豐七年(1857)出任太倉州巡檢，自稱「謬廁司馬，係五品」銜。名倉引侯儀為所交「友人中最親者」，並稱其「本為西門之儒員，然歷官登庸司馬之職者，其人淳良，且才學兵學頗有過人之處」。侯儀於名倉則有「前聞貴邦素重交誼，今見大兄果然風雅宜人，而且情至誼盡，真不禁有相見恨晚、分別太速之歎」。¹⁰⁸ 關於陳汝欽在武士們的訪華實錄中的引人注目處，在於他不但與名倉交往密切，甚至與高杉也有過相當深入的交流。陳汝欽在交流中有別於其他中國士人的地方，似乎在於他的坦誠。最顯著的例子見其6月13日初識名倉時的自我介紹：「僕姓陳名汝欽，號勉生，浙江天臺人也。少年雞窗讀書，輒以翰花自許，不料采芹後急於進取，循大朝捐餉之例，奉旨以巡檢分發江蘇補用。現署蘇州府吳縣光福司巡檢事，兼此盤查奸細之役。微員末秩，自悔不及，貴兄事也，幸勿笑之。」¹⁰⁹ 毫無城府地向異國人坦言自己捐納出身，可見陳汝欽個性坦誠。與此相聯繫的還有他的年齡問題。7月11日名倉訪西門防所，問「道光鴉片役滬城殆致陷沒」的戰況，陳汝欽作答中有「鴉片役時，弟年猶少」一說。由此可推斷1862年陳汝欽年紀在三十上下，這在與日本武士交往的中國士紳中屬年輕者之列。陳汝欽對日本武士關於中國自第一次鴉片戰爭以來的國情的提問傾其所知作答，尤其關於近前的蘇南戰局問題，陳汝欽1860年春「于金閭〔蘇州別稱〕未失之時，於役太湖水營，三月又曾至浙江之

¹⁰⁷ 《遊清五錄》，頁112。中國士大夫筆下載朝鮮使臣李藕船(名尚迪)來華有道光二十五、二十六年(1845、1846)、咸豐九年(1860)，從溫忠彥道光十七年(1837)中舉而言，其旅京與李氏交遊當係道光年間事。見《柏硯山房文集》，清咸豐六年(1856)刊本，卷一一，頁九；《桐溪達叟自編年譜》，頁三九。

¹⁰⁸ 名倉以日本古兵書《兵要錄》請侯儀「賜高批賢評」，請王互甫助他入淮軍大營觀操，均如其願。因此將兩位分列為「最親者」和「後之親者」的中國友人。見《滬城筆話》，五月十七、十九、二十一日，六月初七(6月13、15、17日，7月4日)；《海外日錄》，頁426，431；《太倉州志》(民國八年[1919])，卷一一，頁三六。

¹⁰⁹ 名倉以「貴兄」稱之，因此陳汝欽自謙「貴兄事也，幸勿笑之」。《臺州府志》「選舉表」「雜選」欄：「陳汝欽，字勉生，照子，增貢生，如臯巡檢。」志書言及其父名，表明陳汝欽出自有相當背景的家庭。見《滬城筆話》，五月十七日、六月十五日(6月13日、7月11日)；《臺州府志》(民國二十五年[1936])，卷二八，頁四〇。

長興」，他以親歷者身分坦誠相告，更令日本武士感到滿足，如名倉有所謂「始聞戰地實踐之言，豈可堪喜哉」之說。¹¹⁰

儘管高杉在實錄中沒有備載，但還是可以從中讀到陳汝欽與他交往中的不同尋常處。6月15日陳汝欽赴宏記館訪名倉不遇，而識高杉，當日高杉即對陳汝欽表現出格外的好感，自稱「僕亦好談時事」，並主動問其姓名住處，表達了「他日必訪兄」的意願。次日高杉即赴西門訪陳汝欽，日記中毫不吝嗇地表達了對他的好感，稱「汝欽有氣慨，與予氣心能合逢，筆談甚愉快」。6月17日又「作書牘，託名倉贈陳汝欽」，大約該函即提出請陳汝欽作〈楠木書屋記〉。¹¹¹ 7月16日千歲丸即將離滬，高杉訪陳汝欽致別，高杉稱該日「與陳汝欽談，談頗妙」，並暗示所談涉及了敏感的政治話題，所謂「此日予與陳汝欽談素志，不可記之事甚多，因不錄」。¹¹² 而〈留別陳汝欽〉一詩則表達了高杉對陳汝欽的看重：「臨敵勉強武與文，他年應有建功勳。孤身千里歸鄉後，每遇患難又思君。」¹¹³

高杉作為維新運動的先覺者，性情狂介孤傲，其身分地位也高於千歲丸同行的武士，名倉向陳汝欽介紹時有所謂「高杉子一大諸侯之貴臣也」。¹¹⁴ 高杉自稱在千歲丸使節團中能共話者甚少，但卻在上海與一位相交不久的清政府下級官員有甚深的交流，這表明高杉有關時政的言論在陳汝欽處獲得共鳴。雖然這應該說是千歲丸訪華中難得一見的例子，但陳汝欽的生活道路似乎並未因與日本維新運動先覺者高杉晉作的深刻交往而有所變化，他在1862年後的平定太平軍的戰事中似乎沒有值得重視的軍功，而捐納出身則限定了他的仕途前程，直至同治十二年（1873）也僅官至江蘇如臯縣巡檢。¹¹⁵

結語

與千歲丸武士在滬間接或直接交往的中國士紳在中國史料中可查到出處的還有如下數人。如在眾多來訪者中以「儀態出眾」引起日比野注目的葛桐銜。葛桐銜，號稚侯，嘉定人，「道光甲辰〔1844〕舉人，咸豐癸丑〔1853〕進士，由庶常改知縣，官

¹¹⁰ 〈滬城筆話〉，六月十五日（7月11日）、五月十九日（6月15日）。

¹¹¹ 名倉也請陳汝欽作「書屋記」，表明陳汝欽的文才得到日本武士的認可。見〈遊清五錄〉，頁79；〈滬城筆話〉，六月初七（7月3日）。

¹¹² 〈遊清五錄〉，頁117；《「千歲丸」上海行》，頁448。

¹¹³ 「勉強」在日語中是學習、勤奮的意思。見〈遊清五錄〉，頁85。

¹¹⁴ 〈滬城筆話〉，五月二十一日（6月17日）。

¹¹⁵ 同治十年二月至十一年五月署嘉定縣典史。見《通州直隸州志》（光緒元年〔1875〕），卷八，頁二三八；《嘉定縣志》（光緒六年〔1880〕），卷一一，頁三七。

浙江權金華府，洪楊之役在滬辦理善後局，捐資以恤難民。¹¹⁶儘管日比野對其缺乏熱情，葛桐銜還是在日後攜日比野囑託的詩再度入訪，並也向日比野求詩求題寫扇面，¹¹⁷可見葛氏對與日本武士交往的興致。另還有以下諸人：高杉結識的大南門防所的阮松，浙江慈溪人，監生，同治十一年(1872)署太倉州吏目。名倉在新北門防所偶遇的楊溥，雲南蒙自人，拔貢，同治元年(1862)署奉賢知縣。¹¹⁸日比野囑華翼繪書諸葛亮詩，代筆者為當時在李鴻章幕中的秦緬業。「無錫秦氏世為聞家」，秦緬業道光年間以副貢生的功名「長遊京師，所交皆賢豪長者」。¹¹⁹名倉與新北門防所劉文彙甚熟，臨別名倉「至新北門，會晤劉文彙，因知府周存伯其舊」，送書畫於名倉。¹²⁰另外7月6日名倉在新北門防所偶遇嚴伯雅，7月15日西門防所的陳汝欽就問名倉：「聞大兄與吾邦嚴伯雅最稱莫逆，果然？」¹²¹這些情節都透露了一個事實，即中國士紳與千歲丸的日本武士私下交往的信息可能在官場和士紳圈內廣為傳播，並似為李鴻章、馮桂芬、殷兆鏞、潘曾瑋等當時在滬有更高地位的士大夫們得悉。

儘管千歲丸訪滬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同治年間李鴻章等南方政要關注日本問題，是一個有待深入探討的課題，但是存在影響則是肯定的。¹²²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以來內外交困的政局令士紳們欲以近鄰日本的國情作為參照系思考中國的境遇，因此同治初年日本問題是一個相對易於進入中國南方政界視野的時期。1859年3

¹¹⁶ 〈贅疣錄〉，頁102；《嘉定縣續志》，卷一一，頁一。

¹¹⁷ 〈贅疣錄〉，頁107。

¹¹⁸ 〈遊清五錄〉，頁82；《太倉州志》(民國八年(1919))，卷一一，頁三九至四〇；《松江府續志》，卷二〇，頁四四。

¹¹⁹ 秦緬業(1813-1883)，字澹如，「道光丙午〔1846〕副榜」，其曾叔祖秦蕙田係乾隆帝寵臣，父秦瀛「官至兵部侍郎」。見〈贅疣錄〉，頁159；孫衣言：〈秦君澹如墓誌銘〉，載《碑傳集補》，卷一七，頁二九至三二；《郭嵩燾日記》(二)，頁62。

¹²⁰ 〈海外日錄〉，頁433。劉文彙可能係劉文澈之誤，據咸豐十年(1860)初夏〈蘇松太道呈防務部署大略〉：「北門、振武臺兩處，委員劉文澈會同英、法二國兵將駐紮巡防。」周閑，字存伯，別號范湖居士，浙江秀水人，有《范湖草堂遺稿》傳世。1850年代初周閑在吳縣知縣丁國恩幕參與平定小刀會，並以六品軍功賞戴花翎；1860年前蘇州知府吳雲建議蘇松太道吳煦任命周閑署婁縣知縣；1862年秋潘曾瑋向郭嵩燾薦舉周閑，極誦其賢。周閑以書畫名於士大夫間，1858年與吳大澂等結畫社於蘇州虎丘，1861年吳氏流寓滬上，二氏頻頻切磋書畫。見《吳煦檔案選編》，第一輯，頁271，318，320；〈憲齋日記〉，載《清代日記彙抄》，頁276-82；《郭嵩燾日記》(二)，頁75。

¹²¹ 〈滬城筆話〉，六月十九日(7月15日)。

¹²² 同治年間李鴻章、丁日昌的函奏稿中不乏以日本國情觀照中國問題的例子。見《李文忠公全集》，清光緒戊申(1908)刊本，卷一二〈朋僚函稿〉，頁三；《曾國藩未刊往來函稿》(長沙：嶽麓書社，1986年)，頁314。

月，在滬受聘於美國傳教士裨治文 (Elijah C. Bridgman, 1801–1861) 的管嗣複致函馮桂芬，傳遞日本國情：「日本國亦能製造火輪船，遊駛西洋，偵探各國虛實，舟人都通西洋各國語言文字，其用心可謂周密，將來能與西人抗者，日本其一也。」¹²³ 馮桂芬著於1860–1861年間的《校邠廬抗議》中〈製洋器議〉篇，對該資訊作了發揮：「前年西夷突入日本國度，求通市，許之，未幾，日本亦駕火輪船十數遍歷西洋，報聘各國，多所要約，諸國知其意，亦許之。日本蕞爾國耳，尚知發奮為雄，獨我大國，將納汗含垢以終古哉？」¹²⁴ 咸同之間不乏類似馮桂芬感慨的例子。1861年初，身居曾國藩幕中要位的趙烈文來滬，在王韜處得讀日本賴山陽著成於1827年的史學名著《日本外史》。該書關於元世祖忽必烈挾征服中原之餘威，「合漢胡韓兵凡十餘萬人」「入寇」日本列島遭全軍覆沒史實的陳述及評論，¹²⁵ 令趙烈文發生如下聯繫現實的感想：「元世祖威遍華夏，興十萬之師而不能得之於日本，雖若有天助，然亦其國修明，足以禦侮，非盡僥倖也。邇來泰西與之通商，炮火之精，舟楫之利，以蕞爾小國，夷然處之而不驚。嗟乎！安在地廣人眾始為強哉？」¹²⁶ 《日本外史》雖然是一部關於日本歷代武家政治興衰史的著作，但貫穿了「尊王」——尊崇「萬世一系」的天皇體制的政治道德意識，具體表現在日本的對外關係問題上，賴山陽將維護日本的獨立地位作為評價歷代武家政權的唯一標準。趙烈文讀《日本外史》的感想，表明其關於中、日兩國應對西力東漸挑戰舉措的對比中包含有歷史反省的深層內涵。中日關係的話題中蘊含有歷史反省，這於清代江南士紳而言是一由來已久的政治文化現象。當清代江南士紳關注海外事務時，身處異族統治的政治現實，以及近鄰小國日本始終於「中華朝貢體制」之外傲然獨立的現實，不能不在關注者心理上投下陰影。這種心理陰影使得江南士紳關注日本的言論中始終存在強烈的中日對比意識。¹²⁷

¹²³ 《王韜日記》，頁91。薩摩藩設立「集成館」實施製造輪船計劃，並在1855年進行了裝備自製蒸汽機船隻的試航，幕府派遣由日本人獨立駕駛的「咸臨丸」訪美，於1860年初出發。管嗣複傳述的資訊符合這一背景。

¹²⁴ 《校邠廬抗議》(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頁50。

¹²⁵ 賴山陽關於鎌倉幕府後期北條氏政權的史論：「〔北條氏〕時宗之禦元虜，保我天子之國，……否則我幾何而不為趙宋也。」並以此對比室町幕府足利氏政權及後來的豐臣秀吉對明代中國關係，謂：「足利氏屈膝外響不足言已，豐臣氏能不辱國體，勝足利氏萬萬，然至與明戰，張皇太甚，內自困敝，雖攻守勢異，不足北條氏遠矣。」見《日本外史》，松平氏藏版(明治二十九年〔1896〕)，卷四，頁二二至二三、三四。

¹²⁶ 轉引自江慶柏：《近代江蘇藏書研究》(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00年)，頁75；〈能靜居士日記〉，載《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166。

¹²⁷ 千歲丸訪華日本武士的「皇國」意識與中國士紳的「天朝」意識的對抗，並不是在近代國際環境下才有的現象。就對抗激烈程度而言，1826年川沙遣返日本漂流民事件留下的〈漂流人歸帆送別之詩〉絲毫不亞於千歲丸訪華實錄。至於1816年梅曾亮有感於日本漂
〔下轉頁187〕

以千歲丸訪華為標誌開啟的近代中日交通繼承了此前中日關係歷史的全部遺產，日本江戶時代的「華夷變態」的中國觀和清代江南士紳強烈的中日對比意識均在其中居重要地位。1862年7月31日千歲丸駛離上海，10月5日抵滬的郭嵩燾於同月30日在潘曾瑋處得閱英國與日本通商條約的文本。對照清廷與英國等列強訂立的條約，郭嵩燾發出「足增中國之愧」的沈痛慨歎。¹²⁸而且日本在近代複雜的國際環境下的開國動向，迅速地將中國士紳的對比意識推向潛在的對抗意識。1864年春，李鴻章就「自強之道」答總理衙門問已明確地顯示出這一演變的趨向：

前者英法各國，以日本為外府，肆意誅求。日本君臣發憤為雄，選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聰秀者，往西國製器廠師習各藝，又購製器之器，在本國製習，現在已能駕駛輪船，造放炸炮。去年英人虛聲恫喝，以兵臨之，然英人所恃為攻戰之利者，彼已分擅其長，用是凝然不動。而英人固無如之何也。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國遠，而距中國近，我有以自立，則將附麗於我，窺伺西人之短長；我無以自強，則將效尤於彼，分西人之利藪。日本以海外區區小國，尚能及時改轍，知所取法。然則我中國深維窮極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變計矣。¹²⁹

千歲丸訪滬對同治年間中國南方政界關注日本問題的政治動向具有潛在的推動作用，包括1870年面對明治政府的建交談判要求南方政界表現出相對積極的應對舉措。但對這種推動作用不能有太樂觀的評價，僅從已見千歲丸日本武士的訪滬實錄而言，中國士紳似乎滿足於與同文的日本武士交流中的風雅情趣以及文化上受尊崇的感受。¹³⁰如果考慮到在近代挑戰來臨之際，中國政府層面仍抱殘守缺地固

〔上接頁186〕

流民在華表現而作的〈記日本國事〉，以及1840年代梁章鉅回顧明清兩代中日關係而所作的〈日本〉等，亦都有明顯的對比意識。見《東亞文明的共振與環流》，頁214-17；《柏硯山房文集》，卷一〇，頁一；《浪跡叢談、續談、三談》（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66-67。

¹²⁸ 《郭嵩燾日記》（二），頁66。

¹²⁹ 同治二年（1863）春清廷就「都察院代陳揀選知縣桂文燦條陳」著各衙門議奏。該條陳有所謂「聞日本近遣幼童分往俄美兩國，學習製造船炮鉛藥，及一切軍器之法，期以十年而回，此事如確，日本必強，有明倭患，可為豫慮」。總理衙門奕訢奏中亦稱：「日本分遣幼童遣往俄美兩國學習，臣等已有風聞，並聞其特派官員前往訪求。」此例表明早在1863年春奕訢、桂文燦等已從駐京西方外交官處獲得有關日本的資訊。見《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一五，頁三二、三三，卷二五，頁九至一〇。

¹³⁰ 中國方面關於1862年千歲丸訪華事件有實錄意義的文字，筆者迄今僅見如下一例。蘇州吳縣人「夢村遁客」同治初年日記〈虎窟紀略〉中錄其堂弟，時在上海「善昌洋行」謀事的王國寶函，「書中言八月〔當係六月〕中有日本國商來，頗通文墨，以詩索和」，並王

〔下轉頁188〕



易惠莉

守中華朝貢體制的傳統對外關係觀念，民間層面的對外交往活動仍停留在傳統的文化及精神狀態並不足怪。透過日本武士的訪滬實錄提供的中日士者交流的歷史場景和交流內容，可能並值得進一步探討的還有如下問題：即與千歲丸日本武士交流的中國士紳的行為，多大程度上是受二百多年來華商在長崎與日本漢學者誦酒唱和的韻事逸聞流傳的影響，多大程度上是出於以這樣的交遊來消解1862年時局背景下個人的愁悶壓抑情緒的動機。如果是後者，它又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那個時代環境下這些士紳的精神，即使不能將其批判為他們的社會道德責任感的麻木和缺失，也應該指出在那樣一個富於挑戰性的時代，他們的精神和思想狀況仍未有改觀。這些士紳與日本武士思想和精神上的距離是顯而易見的。¹³¹

通過本文關於日本武士們實錄中出現的部分中國士紳人物的家世、個人經歷以及雙方交往內容的揭示，可以明瞭屬於地方上最有聲望地位的一些士紳家族在1862年紛紛向日本武士敞開了大門。對於日本武士而言，同這樣的士紳階層近距離接觸的經驗，對其透視中國社會政治及文化問題的價值是不言而喻的。雖然兩個月的逗留，來訪者在瞭解中國正發生的事件的來由方面尚有細節上的欠缺，但是他們對1862年歷史場景下的中國士紳階層的精神文化狀態的透視卻是深刻的。這是對千歲丸訪滬實錄的史料價值應有的評價。千歲丸訪滬對於日本而言，二百多年鎖國後首次實地考察中國社會現狀，為其實踐開國政策提供了經驗借鑑。史實業已證明千歲丸訪滬對於日本近代對華外交的重要意義，日本武士與中國地方政府建立起來的私人關係為幕末和明治初日本政府推進對華外交打下了深厚的人事基礎。另外，千歲丸訪滬標誌著長期主導日本社會的「華夷變態」中國觀內涵的近代轉變——從江戶時代以滿清統治中原為內涵到幕末明治初以西方列強在華勢力為內涵——的完成，¹³² 明治時期長期作為日本政府及民間對華外交政策理論支持的「興亞論」

〔上接頁187〕

國寶唱和日本武士的詩作。王國寶(字植三)「咸豐己未(1859)舉鄉試第三，再上春官不第」，1860年蘇州城陷後赴滬，其間與馮桂芬父子關係密切。蘇南平靖後王國寶隨淮軍北上平捻，同治六年(1867)奉委代理山西垣曲縣事，當年殉難於任。見《吳縣誌》(民國二十二年〔1933〕版)，卷六九上，頁二五；《太平天國史料專輯》，頁14，28，46，53；〈馮申之先生日記〉，頁288，289。

¹³¹ 千歲丸訪滬實錄呈現了江南士紳生活精神狀態與江南水深火熱的時局背景難於協調的矛盾性，並不足質疑實錄的真實性。讀咸同之間流寓滬上的家世厚實的江南士人，如馮芳緝、吳大澂(當時受聘於流寓滬上的前蘇州知府吳雲，整理其私家書畫藏品)的旅滬日記，關於江南士紳生活和精神狀態的感想幾無差異。

¹³² 中國關於太平軍運動最新動態的作品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中期前已經及時傳入日本。除以手抄本廣泛流傳外，1854年有《粵匪大略》(漢文)翻刻，1855年吉田松蔭以《清國咸豐亂記》為題譯羅森著《南京紀事》(亦稱《滿清紀事》)為日文。吉田松蔭1855年3月15

〔下轉頁190〕

社會思潮即是在這樣的基礎上發展而來。就此而言，導致以後日本對中國發動侵略戰爭的某些思想、文化及社會政治的基本要素，已經蘊涵在1862年中日近代交通最初開端的歷史場景中了。有關這個問題，筆者將另文討論。

〔上接頁189〕

日作〈與赤川淡水書〉，該文雖以「華夷變態」說中國士人面對太平軍運動的政治文化思想困境，但從儒學忠孝節義觀念出發，並不以為「反清」為士人應有的立場。這樣的觀點已經代表了江戶時代「華夷變態」中國觀的蛻變。直至二十世紀初日本興亞論者仍延續這樣的中國觀。見《太平天國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467；增田涉（著）、由其民、周啟乾（譯）：《西學東漸與中日文化交流》（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3年），頁96-97，199-229；《吉田松蔭遺墨》（上海：商務印書館，缺出版日期），卷中，頁二四；〈支那教育問題〉，載《楊度集》（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62。



Japanese *Bushi*'s Records on Chinese Gentries during Visit to Shanghai with *Chitosei Maru* in 1862

(A Summary)

Yi Huili



The visit of *Chitosei maru* to Shanghai in 1862 was a turning point in Sino-Japanese cultural intercourse when the centre of activities was transposed from Nagasaki to Shanghai. *Chitosei maru* was the first Japanese commercial ship dispatched by Edo's *Bakufu* to Shanghai from Nagasaki. Its arrival in Shanghai signalled the end of the Nagasaki trade system, the most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Bakufu*'s *sokoku* (national isolation) policy which had been enforced for over two hundred years. With the shift of the centre of Sino-Japanese cultural intercourse, Shanghai became the window through which Japan learned about China and the world. This historic event involv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indset of the participants on both sides of the cultural intercourse and the change in the contents of the intercourse. Those young *bushi*, following the officials from the *Bakufu* and Nagasaki, took records of their visit to Shanghai. They provided rich source materials for research on this historic Sino-Japanese encounter.

In using these records for research on the inception of modern Sino-Japanese cultural intercourse, however, it is essential to peruse the conduct and attitude of those Jiangnan Chinese gentries. Then we can gain a clear picture of the origin and meaning of this cultural intercourse and accurately gauge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Chitosei maru* visit. In addition, three particular points deserve attention. First, the *bushi*'s records vividly reflected the nature of the prominent Chinese social classes in the Jiangnan region who were the subject of their encounter, hence they provided a very unique source material to be appraised for the study of local history. Second, *Chitosei maru*'s visit to Shanghai ended the Nagasaki trade system and opened a new venue, thus it played a historical role in Sino-Japanese cultural intercourse and provided a basis for evaluating the benefits China received from Japan through the old trade system for over two centuries. Third, much as the Jiangnan region was filled with the hostile memory of the Wako depredation and Sino-Japanese military conflict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it is instructive to examine how the Chinese gentries responded to the reappearance of the Japanese sword-carrying *bushi* in Shanghai two hundred years later. It is hoped that the present paper, with a careful and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records of the *bushi*'s visit to Shanghai in 1862, will shed light on some of these important issues in modern Sino-Japanese cultural intercourse.

